



中外传播思想史
黄旦 主编

美国传播思想史

胡翼青 张军芳 著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 Thoughts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外传播思想史
黄旦 主编

美国传播思想史

胡翼青 张军芳 著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 Thoughts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传播思想史/胡翼青,张军芳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9
(中外传播思想史/黄旦主编)
ISBN 978-7-309-13643-2

I. ①美… II. ①胡…②张… III. ①传播学-思想史-美国 IV. ①G206-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9701 号

美国传播思想史

胡翼青 张军芳 著
责任编辑/黄 冲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 字数 202 千

201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643-2/G · 1836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 ■ ■ ■ ■

我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外传播思想史”终告完成,各卷书稿将陆续出版。

从项目申报到今天出版,经历了一个很是漫长的过程。当然,这主要是我这个项目负责人没有当好。现在想来,集体合作项目,需要抓住时机一气呵成,如果时松时紧,每个人手头事情又多,就很难再凝聚气势和力量。时间一长,自然就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就拿这个课题来说,期间参与人员就换了好几拨。好在经过同志们的坚持努力,总算圆满结项。于我而言,真是如释重负。在此,首先对项目组的所有成员表示由衷感谢。

项目启动时,曾就其基本构架有过几番讨论。当时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以时间为线索,按照传播思想的重要变化划分其阶段,由此推究展示其演变轨迹;二是以专题形式,辅之以一定的时间线索,也就是大致是按先后出现的相关传播思想的一些主要论题而展开。经过大家再三讨论,最后达成共识采纳后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整个项目跨度大,涉及面广,试图在全面把握中理出其内在的历史变化逻辑线索,并且做到每一个变化的节点都拿捏准确,且不说学识和能力,就材料的阅读整理分析归并,工作量也是太大。现在来看,这个选择还是明智的。专题形式比较灵活: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或深或浅,或断或续,可以依据问题相应处理。专题形式的关键,在于论题的选择以及阐释。论题不仅要选得合适,而且还要涵盖和体现传播思想变化中的重要问题,这很见功力和学识。当然,专题式的短处也是一目了然,比如各个论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显得不够紧密,思想变化的历史环节也不易得到一一展现。学术研究总是量力而行,难以面面兼顾,我们目前所取之写法,其遗漏和遮蔽在所难免,更谈不上完美,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记得马特拉在《传播学简史》中说过这样的话:“传播学概念提出的问题和传播现象本身一样多,各种概念还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与其他理论定义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立。每个学派还包含很多不同的流派,远不像‘学派’这个词所表示的那样统一。”^①克瑞格的《作为一个领域的传播理论》一文,

^① [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导言,第2页。

也正是从这样的面向,比较分析了传播研究各种路径及其对传播的认定,并对之作了进一步展示和说明。所以有学者曾提出,传播与其说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概念的家族。这,也成为我们在研究中面临的一个很大困扰,即如何界定传播并贯穿在所有子课题之中。大家为此翻来覆去讨论了好几次,最后感觉难以归于一统,比如欧洲各国与美国差别很大,无论是传播思想的来源、知识基础和文化背景,都是如此。就大众传播研究的发源地美国而言,即便是按照詹姆斯·凯瑞从文化角度的最简约化划分,也有“传递观”和“仪式观”之别。凡此种种,要在“中外传播思想史”这样的项目中,圈定一个“传播”并以此为准,一方面很难,另一方面也给研究者造成诸多约束,更不必说可能会因名失义,反而模糊了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传播思想的各自特点。于此,最终决定由各子课题负责人根据自己研究的具体语境处理,不再坚持一个统一的标准概念。此种颇有后现代意味的多元化,解放了各个子课题的手脚,以便更加贴近历史实际,但显而易见,也会带来各自的差异性:框架体例,突出的重点,叙述线索,甚至行文风格,均不统一。好在各卷本来就是合可一体,分则独立,倒也不会带来什么太大的影响。现在想来,当时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即不是去找一个原点式的概念,而是把“传播”重新概念化,赋予其不同层面的含义,这样既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特性,同时又不致散漫。现在说这话当然是马后炮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事后聪明虽然留有遗憾,或许可以为后来者做“亡羊补牢”之助。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思想史的研究是难度很高的一个领域。抛开研究者必需的综合知识学养、锐利的历史辨析眼光、纵横交错的总体把握能力等不谈,“思想”本身的理解及其呈现和如何呈现,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这里不是展开充分讨论这些问题的合适场合,挑最简单的,“思想”的厘定及其与观念、学术研究、知识等关系的处理,就是首要的难题。其次,传播“思想”与传播实践密不可分,没有离开实践的光秃秃的“思想”,“思想”一定以实践为依托,是实践问题在“思想”层面的呈现,但实践毕竟不是思想也不能取代思想。恰如有学者所言,“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思想史研究,这是当代史学的主流思潮。不过,我们始终不应忘记的是,那是谁的问题?问题在现实情境中产生,人们需要通过重构历史来为现实中该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合理化论证。思想史研究同样如此。只有思想史家意识到他的研究并不只是呈现纯粹的观念层面或思想层面的精神交往现象,同时还应该依据不同的现实情境赋予观念或思想不同的意义,以便回答研究者认为出现在该情境中的问题,那么,理想的思想史研究就必定应该是内在与外在相融、内容与情境统一的研究。”^①总而言之,传

^① 陈新:《历史学的归途:全球化情境下的思想史写作》,引自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思想史的元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播思想总是在具体传播实践及其场景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自然形成的思想史,因此,如何切割出“思想”,其依据是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传播思想研究者无法回避且又不能不时自我警醒的问题。我在《传播思想/思想史的尺度》那个讲演^①中,试图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既含有对同道们的期望,更多则是针对自己的反省和诘问。我们这个项目的研究,自一开始就贯彻这样的要求,并且大家也是为此而认真探索和努力,至于做得如何,则需要读者来评定。坦率说,由于各自的理解和把握不一,在这方面出现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肯定在所难免,非常迫切期待大家的批评。

项目设计申报时的状况与今天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别的不说,类似的研究及其成果,就远比过去多。我们是启动研究在前,成果形成在后,像一句俗语说的,“早开的航船晚靠岸”。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关注这种变化,并且也十分注意根据新的情况,作出各种调整,在展示研究最新进展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无形中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的成果不是要为已有的书作补充,相反,在研究的思路、框架的设置、材料文献的征用、分析概括的见解,都要追求显示自己的新意和特色,相信读者对此是有判断的。在此,我要再次向项目组的各位同仁表示深深谢意,是大家的辛勤和坚持,才有我们和读者一起分享成果的今天。

黄 旦

2016年8月

^① 2016年3月27日,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问题域与关键词:传播革命时代的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学术会议上的主题演讲。

目录

■ 绪 论	001
■ 第一章 自由主义报刊理念	008
第一节 出版自由理念的思想渊源	008
第二节 新闻自由的历程	018
第三节 新闻自由的实践	024
■ 第二章 独立报刊理念	030
第一节 独立新闻业的兴起	030
第二节 报纸成为公共服务机构	036
第三节 客观报道理念与新闻专业主义	040
■ 第三章 电报对传播观念的冲击	051
第一节 “闪电线路”——电报技术与美国人的传播时空观	051
第二节 电报与新闻业——新闻时效性、“电报体新闻”与 通讯社.....	061
第三节 妖魔化：关于电报的质疑声浪	071
■ 第四章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	076
第一节 作为共同体的公众	076
第二节 芝加哥学派的传播观	080
第三节 重塑共同体：芝加哥学派传播观的民主意涵	083

■ 第五章	电影的兴起与影响	095
第一节	电影：美国大众文化的重要推动者	096
第二节	美国电影院的受众	102
第三节	电影的效果	109
■ 第六章	广播：天空中传来的声音	122
第一节	从社交媒体到大众传播	123
第二节	舆论共识制造者	130
第三节	广播受众研究与大众传播学的开端	139
■ 第七章	现代性视野中的电视	148
第一节	从沉默的羔羊到沙发上的土豆	150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与电视业的商业扩张	157
第三节	不同学术话语中的电视研究	161
■ 第八章	公共新闻理念	172
第一节	公共新闻的兴起	172
第二节	公共新闻理念及论争	175
■ 结语：以媒介为中心的传播思想史研究		185
■ 参考文献		192
■ 后记		200

绪 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笔者开始学习外国新闻史的时候,便有一种困惑始终萦绕在心头,那就是外国新闻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了解那么多媒体的所作所为(或者尖刻地说是一些关于媒体的空洞档案),并且将其尘封于自己的记忆中,其意义何在。“把编年史清除杂质、分成断简、重新加以组合、重新加经安排以后,它们永远还是编年史,就是说,还是空洞的叙述;把文献恢复过来、重现出来,加以描绘、加以排比,它们仍旧是文献,就是说,仍旧是无言的事物。”^①更何况,这些空洞的历史档案在今天对于多数人而言,是无法被正确理解的。于是,这种困惑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其一是建立在史学方法论之上的问题。传媒史是想堆砌和整理我们在各国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上那些确定发生的事实,还是想探索那些未知的历史事实。或者换句话说,外国新闻史上确定发生的事实和那些需要进一步发现的事实在重要性程度上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前者为后者服务呢,还是前者是这一学科唯一重要的信息,需要加以整理与陈列?

其二是关于史学研究题材与对象的问题。新闻媒体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和形塑的关系。只是将研究视角放在新闻媒体的从业者与相关新闻事件上,是否就能呈现历史事件的意义。如果传媒历史的写作不能呈现或推测与当时传媒有关的个体的所思所想以及与传媒有关的社会心理与日常生活,那么这种史料的堆砌到底对新闻传播学科有什么意义?

对于第一个问题,柯林武德很早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很显然倾向于探索未知的历史事实:“我认为,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同意:历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总的说来,它属于我们所称的科学,也就是我们提出问题并试图作出答案所依靠的那种思想形式。重要之点在于认识,一般地说,科学并不在于把我们

^① [意]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仁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已经知道的东西收集起来并把它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整理,而在于把握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东西,并努力去发现它。耐心地对待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物,对于这一目的可能是一种有用的手段,但它并不是目的本身。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手段。它仅仅在新的整理对我们已经决定提出的问题能给我们以答案的限度内,才在科学上是有价值的。”^①柯林武德对于什么是科学的历史观有着与前人完全不同的观念。当他将客观、科学地整理史料作为史学的手段时,就与兰克的史学观产生了根本的分歧。柯林武德眼中的历史学,只有一点与科学相通,那就是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精神。至于自然科学的那一套研究手段,在柯林武德看来并不适用于史学的研究。

从这一点来看,以往的新闻史研究尤其是编年史和国别史的研究,把研究目的与手段完全给颠倒了。新闻史上那些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件,只是为进一步探索和诠释那些还没有被发现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关联,并不是研究的终点与目的。“历史学……其任务乃是要研究为我们的观察所不能及的那些事件,而且要从推理上研究这些事件;它根据的是另外某种为我们的观察所及的事物来论证它们。”^②这说明,知道达纳是什么时候办《纽约太阳报》,《纽约太阳报》的文本是什么样的,有过哪些著名事件,这些只是我们的起点而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探索的是在这之外的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和观察的史实或者是被这些已知事件遮蔽了的历史事件。

对于第二个问题,柯林武德的想法同样也有借鉴意义。他认为,我们根本无法真正说清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所有真相,历史学只是历史学家在思想中对历史人物的推测和重演。所以,对于历史的研究只能是对于思想和观念的研究。“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历史。”^③写到这里,柯林武德便自然而然地宣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伟大断言也许与本研究所说的传播思想史不是一回事。但他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提醒了我们,除非我们能够重行和展示当时媒介及其从业者的观念与社会的观念,以及其微妙和复杂的互动,否则我们的历史书写就是档案整理而非真正的历史学。还是以《纽约太阳报》为例,我们更需要知道《纽约太阳报》是如何影响当时的社会以及当时的社会又是如何影响《纽约太阳报》的,它塑造了美国人什么样的文化与心灵,又是如何适应和强化这

① [英]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 页。

② 同上书,第 285 页。

③ 同上书,第 344 页。

种文化与心灵的。如果没有这些,《纽约太阳报》的编年史呈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种研究范式的变革:从新闻史走向思想史,这便是我们书写美国传播思想史的首要原因。这里所说的思想史,指的是与媒介相关的社会观念的发展史,这些观念绝不仅仅是新闻专业的观念,也不仅仅是关于媒体的学术观念,它还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与观念。因此,用思想史而不是学术史、社会史来概括本研究的历史观是最为贴切的。

然而,一旦当我们决定这样来书写历史,便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注定了它是一个开放和不完善的文本。做思想史是一个重行思想的过程,其方法如柯林武德所说,是一个对历史观念重演的过程。

假设他正在阅读一位古代哲学家的一段文章。他再一次必须在一种语言学的意义上懂得那些词句,而且必须能够进行语法分析;但是这样做,他还是不曾像一位哲学史家理解那段文字那样理解它。为了做到那一点,他就必须明了它的作者在这里陈述了他解答的那个哲学问题是什么。他必须为他自己思想出那个问题来,必须明了对它可能提供的各种可能解答都是什么,而且必须明了这位个别的哲学家为什么选择了那种解答而不是另一种。这就意味着要为他自己重行思想他的作者的思想,而缺少了这一点,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成为有关那位作者的哲学史家。^①

然而这种重演必然意味着写作者本人的主观推测和挂一漏万,它也必然不是历史真相的还原。因此,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观念和思想的重新推演注定只是一种理论的想象,尽管这种想象已经最大限度地遵循可以观察到和收集到的史料。然而,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只能这样来看待本研究,它是本研究作者们的一种尝试,它提供了关于这一段思想史的“我们”的视角,希望能够达成的结果是在其他研究者与我们自身的批判、反思与修正中,获得更多关于这一段历史的阐释、思考和启发。

写传播思想史当然没法绕开美国。美国是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但这并不影响它在传播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美国与所有自然生长的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开创者在其生态环境仍然是一片荒凉的状态下已经具备了启蒙时代的人类思想。因此,它在人类现代性的进程中成为一个独特个案。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民主观念、市场观念和对科学的崇拜,为传播在美

^① [英]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0页。

国的茁壮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本研究要考察的也恰恰就是在国家、市场(或曰资本)与技术三种话语的作用下,美国的传播观念发生着何种变迁。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美国的民主是天然形成的。这是因为美国人在财富上的差距不大,受教育程度也相差不多。“在新英格兰落户的移民,在祖国时都是一些无拘无束的人。他们在美洲的土地上联合起来以后,立即使社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景象。在这个社会里,既没有大领主,又没有属民;而且可以说,既没有穷人,又没有富人。”“美国人的起源,或我称之为他们的出发点,对美国目前的繁荣作出过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贡献。美国人生而有幸和生得其所。他们的祖先昔日把身份平等和资源平等带到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上,所以民主共和制度必然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下应运而生。”^①而且美国人的制度尤其是相关法律制度又为这种平等作了相应的保障,比如其遗产继承制度。这些制度推行的结果,使得各种平等成为一种自然的形态,而贵族制度在美国几乎完全没有市场。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在历史上有记录的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国,人们不仅在财富上平等,甚至他们本身的学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等的。

我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口与美国大致相等的国家会像美国这样,无知的人竟如此之少,而有学识的人又如此不多。

……

在美国,人的知识处于一种中等水平。所有的人都接近这个水平:有的人比它高一点,有的人比它低一点。

……

由此可见,在美国自始就一向薄弱的贵族因素,今天即使没有被完全摧毁,至少也一筹莫展,以致已经难于对事态的进程发生影响。

与此相反,时间、事件和法律却使民主因素不仅发展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因素,而且变成独一无二的因素。^②

不仅是平等,联邦制所带来的自由也是美国早期政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年近乎形同虚设的中央政府几乎指挥不动任何州的军队;而涉及各州利益时,旷日持久的争吵与社会契约的艰难达成是一切美国国内政治的典型特征,甚至连美国宪法也是在这种争吵中诞生的。查尔斯·A.比尔德是这么总结制宪会议的结局的:

①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322页。

② 同上书,第58—59页。

经过了将近4个月的辩论,会议在9月17日结束了它的工作。宪法起草完成了,要求批准的方案制定了。有些代表对同僚们的决议愤愤不平,已经气冲冲地回家;有些留下来的代表拒绝在文件上签名,公开指责并反对交给人民通过。另一方面,在55名曾出席一次或几次会议的代表中,有39名在羊皮纸文件上签了名,连同他们的祝福送了出去,尽管他们对这一共同作品的热情在程度上是大相悬殊的。^①

看上去,联邦体制根本就没有秩序感,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领导地方的能力。“(联邦体制)异常忠实地符合那些曾经发动革命的激进派的思想。在他们的几个殖民地,他们曾经反抗过英政府在财政、商业和政治上实行的控制;通过战争,他们已经审慎地摧毁了那种支配权;他们不愿代之以一个表现为中央政府形式的强大而有效的政府。”^②然而这种看上去缺乏效率的体制不但能够保障民主,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保障自由。“没有人比我更赏识联邦制的优点。我认为,联邦制度是最有利于人类繁荣和自由的强大组织形式之一。”^③这些特征在南北战争之后才渐渐有所变迁。

在这样一种民主和自由的国家氛围中,新闻传播的发展几乎天然会与民主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党为了取胜而使用的两大武器,是办报和结社。”^④在政党报刊的时代,尽管各种谣言和人身攻击充斥于当时的出版物,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时美国的出版自由。本书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阐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语境中,美国报业的自由主义观念和专业主义观念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当然,随着20世纪以后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不断强化,民族国家与社会控制不断被强调,美国民主与其初始目标渐行渐远。所以,在第八章中,我们将展现的是在公众对公共事务越来越冷漠的今天,公共新闻的实践是多么举步维艰。

当然,国家从来不是影响美国传播观念和传播思想史最重要的话语和力量。纯粹的市场化运作极大地形塑着美国的媒体文化与媒介形态,并且极大地影响着国家与技术的话语。自《纽约太阳报》成为一种独立的产业以来,媒体的经营者总是首先将传播看作一种可以为自己带来利润的商品交换。这种对于财富与市场的迷恋几乎可以被回溯到“五月花号”登上美洲大陆的那一天,因为只有追求财富

^① [美] 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54页。

^② 同上书,第317页。

^③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91—192页。

^④ 同上书,第202页。

的巨大动力才能支撑开拓殖民地这样的冒险行动。追求利润一直被看作美国人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

市场取向极大地引领着媒体领域科学技术的开发,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极其经典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市场之所以要召唤技术(机器),是因为“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①。也就是说,技术之所以被市场所青睐,是因为它有加速资本自我复制的潜能,因此,推动技术革新,利用新技术,成为市场取向的重要特征。几乎文章中涉及的每一种媒体,都率先出现在美国,比如完全没有争议的电报、电话、广播、互联网,甚至是手机。尽管卢米埃尔兄弟最终完善了现代电影,但镍币影院源自爱迪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 BBC 是世界上第一个开播的电视台,但该技术却同样成熟于贝尔实验室。这导致我们在讨论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时,无法不把技术的话语作为我们的隐线。

然而市场取向造成的后果绝不仅仅如此,它所推行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不仅将传媒的产品转化为机械复制的大众文化,而且也将技术手段渗透到了每个家庭的起居室中,成为一张现代性的大网,将现代人裹挟其中。于是,它立刻将大众传媒尤其是广播电视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手段。市场话语便因此不再仅仅是市场话语:舆论一律的统治方式成为可能,而消费社会的神话也不可避免。在战争期间,对大众传播市场的控制成为统治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传播学因此而诞生。于是,在通过新闻自由进行社会分权的社会运动中,通过大众传播进行社会控制的运动也在同时进行。不同的是,前者因被标榜为美国梦而颇受重视与好评,而后者总是悄无声息却渐渐左右了社会的进程。因此在讨论电报、电影、广播和电视传播时,其叙事线条就与报刊新闻有明显的差异。而我们分工之初就有意将这两条线与美国从农业社区国家走向工业社会国家、从地区性国家走向世界霸权国家的时间线索紧密缠绕在一起,以期形成本研究独特的张力。

基于上述分析,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凯瑞认为,在美国的语境中,新闻学天然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而传播学却总是与市场联系在一起,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然而,它们在本书中却是一体两面,它们在传播思想史的语境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力,并因而呈现出无比复杂的传媒文化。

最后需要说说在规划中曾经有过的第 10 章——互联网与新媒体。我们遗憾

^①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08 页。

的是,无法在本研究中让其问世,因为它好像还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我们正身处其中,感知它的日新月异,因而无法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柯林武德曾经指出:“与历史思想有关的某种东西……绝不是一种此时、此地。它的对象乃是已经结束其出现的事件和已经不复存在的条件。只有在它们不再是可知觉的时候,它们才真正变成了历史思想的对象。”^①新媒体来到这个世界不过几十年的历史,但它立即绑架了这个世界,使之处于永不停息且很难预测的状态中。在这短短几十年里,许多被搁置的创造性设想被重新激活,如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从而蕴育着无限的可能性。关于这个脑洞大开的领域的历史探讨,不是本书所能胜任的。确实,要说清楚赛博空间的问题,对于我们而言是个未来学的话题。

^① [英] R. 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

第一章 自由主义报刊理念

波考克认为,19世纪60年代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极大改变了我们对于美国革命一代思想的认知,这些研究体现出:第一,美国革命的精神历程包括对英国反对派思想语汇和观点的诸多重新阐述;第二,通过这一重新阐述,美国革命思想吸纳了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的公民人文主义传统;第三,独立战争及其后的宪法制定使得对公民人文主义古典传统的进一步修订与一定程度上的背离具有了必要性^①。

波考克所论至少传递出两点重要信息:其一,美国革命思想的源流多元;其二,公民人文主义传统在美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遭遇转型危机,美国政治体现出原则的转换。伍德将这一转型危机称为“古典政治的结束”,在古典政治的终结中,伍德发现了美国从共和主义到自由主义的部分转变^②。

革命年代,美国人反复在讲自由,自由融入美国人的日常语汇中。方纳认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和意识中,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概念比自由更至关重要,它深深嵌入美国人的历史文献和日常用语中^③。而如果从传播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美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成为所有其他与传播相关的思想观念之基础的,是出版言论自由,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新闻自由。

第一节 出版自由理念的思想渊源

自由是如此至关重要的概念,方纳却认为,在美国其实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自由,相反,自由观念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冲突和纠葛的演进史,自由的定义

^① Pocock, J. G. 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06.

^② Wood, G. S.,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pp.606-618.

^③ [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页。

与再定义是借助假定存在的自由的对立面来实现的^①。由这一视角看过去，美国新闻自由的思想也就是在那些围绕新闻自由的不同认识和争辩中渐趋明晰的。

帕灵顿认为任何关于美国思想的批评研究都必然要在环绕马萨诸塞海湾的新英格兰地区寻找端倪，这一地区在传统上被视为美国人的那些理想和制度的发祥地。来自英国的清教徒聚居于新英格兰地区，清教究竟从英国带来了何种思想传统？帕灵顿认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他因此将英国独立和辉格党的贡献视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源头之一^②。

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理念有着明确的指向性，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神权的钳制：“自由的主要方面，即宗教自由。”^③而与君权达成的暂时妥协，“是为了保存真正的宗教和人民的自由”，而不是为了要他竭力给我们的信仰带来天主教，给我们的自由带来枷锁，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毁灭，并不是要他引起（如果不是参与策划，像我们后来发现的那样）爱尔兰的大屠杀^④。弥尔顿号召应给予新教徒以宗教自由，英国17世纪另外两位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与约翰·洛克也均提倡宗教自由。作为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垦殖的朝圣者中的一员，威廉·布莱福特明确指出清教徒离开英国正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清教徒眼见自己如此受到骚扰，又看不到继续在英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之下，才决心前往低地国家，因为他们听说那里人人享有宗教自由。但是，出于许多严肃而实在的理由，十多年后他们决定离开荷兰。而在这之前，尽管国王没有根据他们的愿望在他们的请愿书上盖上他的大印，但最后通过周旋还是取得了如下进展：国王陛下准许他们宗教自由并保证不骚扰他们，条件是他们必须和平处事^⑤。

虽然神权是自由主义者抨击的主要目标，但是在他们看来，君权和神权实乃一丘之貉，“正是由于政府和教会的裁判事宜浑然不分，才造成基督徒之间连年相互厮杀的惨境。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不能忍受教皇制。我们与我说它是一种宗教，不如就说它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主教专制政体，它违反了基督本人的戒律而掠夺了许多世俗的权力”^⑥。在弥尔顿看来，国王完全是天主教在

① [美]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页。

② [美] 沃浓·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1620—1920》，陈永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③④ [英] 弥尔顿：《建设自由共和国的简易办法》，殷宝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2页。

⑤ [美] W. 布莱福特：《“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王军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4页。

⑥ [英] 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何宁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6页。